

政府制度供给 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

■ 汤继强

现在,全世界都在谈中小企业融资难,而且把它称之为“世界性难题”,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解读。这10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但它难在何时、难在何处、难在何方?中小企业在什么阶段?困难的具体表现又是什么?

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在地域上是有区别的,在国内和境外是有区别的,在不同体制机制的背景下是有区别的。东部沿海地区像浙江温州、广东、江苏等一些地方,他们也在谈中小企业的融资难,但是对于中国内陆中西部地区来说,像成都这样的内陆城市,中小企业融资难内涵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认为除了中央政府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上责无旁贷之外,地方政府一定可以因地制宜地根据本地的资源要素情况,充分发挥和调动各个方面的资源,来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

中小企业在每一个阶段,都需要不同的融资解决方案

在成都、在成都高新区这些年的实践中,包括全国各地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实践和案例,说明地方政府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上是有作为的。成都的县域经济非常发达,其实就是民营经济发达,中小企业发展良好。成都市有19个区(市)县和高新区,成都高新区只有130平方公里的面积,今年的财政收入将超过200亿元,仔细分析它的收入来源结构,发现其中超过一半以上的贡献是来自科技型的中小企业。事实上,我们在扶持中小企业的过程中是尝到了甜头的。

2006年,我根据工作实践提炼出来一个模式,叫中小企业的“梯形融资模式”,没有想到还获得好几位国家领导人的肯定批示,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我又出了第三本书《中小企业融资模式实务运作与案例分析》,现在美国、韩国已有译本。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原汁原味的“地方造”的东西,但它不仅在促进问题解决方面带来了实际效果,也在客观上把我们解决中小企业的探索这个精神文化层面的东西往外复制了。

我提出的“梯形融资模式”核心东西是什么呢?我当时的想法是,政府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时候要“甘为人梯”,要努力站在一个为企业服务、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角度,出发点是在这里。当然,特别重要的是我参考了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我发现不同的企业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融资需求,许多企业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把它比作一个小孩,一个小孩从出生以后,成长为1岁、2岁、3岁,不同的阶段需要不同的配方奶粉,中小企业在每一个阶段都需要不同的融资解决方案。我看过国内外有许多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案例,要么是银行的

“我认为中国当下,包括此前,包括今后,要真正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政府需要不断地供应灵活而丰富的制度。”

“在不同阶段,政府提供的帮助也就不同,如初创阶段给予企业无偿投入,成长期时帮助引进风险投资,建立企业信用实现债权融资,成熟时期帮助企业改制上市。”

视角,要么是保险的视角,要么是其他的视角,没有站在政府的视角思考问题的。而为什么我又特别强调基于政府的视角来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在中国的体制下,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比政府在调动资源上更具优势和力量。所以说,政府抓中小企业融资难是责无旁贷的。

要真正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政府需要不断地供应灵活而丰富的制度

我和国内各种国有银行以及其他方面的投资人都有过交流,我反复强调一点,我认为中国当下,包括此前,包括今后,要真正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政府需要不断地供应灵活而丰富的制度。前不久和韩国的一批高级访问团交流,他们全是韩国各地研究院的成员,我曾经向他们讨教一点,我说韩国的中小企业融资难不难,是怎么解决的?他们说有一点,韩国的GDP构成,50%是由三星、SK等这样的大集团提供的,另外50%的GDP构成是中小企业提供的,但是他们就保证一点,韩国的信贷投放50%给大企业,有50%是给中小企业。

我认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银行也应该站出来,但仅仅靠银行是不够的。我们的资本市场是不是不那么有序呢?这些民间的流动性是不是说只能存到银行、股市、房市?国务院出了老36条、新36条,国家从政策层面上是非常希望把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解决得更好一些,但这个过程比较漫长,我们一直在探索。

我还思考到另外一个问题,其实中小企业对我们来说,虽然很熟悉,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没有关注到它们。在计划经济时代,哪有中小企业这一说呢。改革开放以后慢慢有

了乡镇企业,发展到今天有中小企业、小微企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制度没有跟上是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本原因。中小企业发展,融资难仅仅是其中一个方面的困难,包括税收、市场、管理、人才,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包括人力成本上升的问题以及前段时说的“三荒”、“三高”的问题。我认为国家应该强力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它的意义不仅在解决就业、推动创新、增加税收上,而且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未来。

在成都高新区里,我们免费给大学生提供一年免房租,水电费都免费,甚至还给5万到10万元不等的种子资金支持优秀创业团队,今年我们拿出8000万元“天使资金”来做这个事情,大学生非常欢迎。

成都市和高新区由过去招商引资的环境优势到后来服务的环境优势,形成今天一个很好的产业发展的环境优势,从投资环境到服务环境,再到发展的环境,实际上我们找到了一个支点,找到一个具有放大效应的杠杆,这就是解决好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方法得当,如果舍得下手,杠杆作用会非常显著。我们先前,政府承担12%的风险、银行承担18%、担保公司承担70%,效果十分好。成都市也积极探索出八种模式,这八种模式非常有效,有些是针对高新技术的信用贷款模式、有的是种子资金无偿提供模式、有的是市县联盟模式,还有“资金池”模式、“市县联保”模式、“统贷统还”模式等,非常受欢迎且效果显著。

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协调促进委员会,来协调处理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

虽然在成都高新区中小企业融

资已经不那么难了,但是我们会继续延伸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思路,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小微企业上。有两个问题是重点,一个是发现机制,一个是培养帮扶机制。要做好培养帮扶工作,首先要有发现的机制。如果有一些非常具有前瞻性的项目,比如一群年轻人已经可以接受银行系统的评价考核的时候,你才去介入,就有点晚了。过去我们强调“官产学研”,现在能不能是“官产学研资”,让资金早一点介入。谁去鉴别这个项目、这群人,能够发现这个好项目、好企业?我强调的是要发挥行业协会和产业联盟的作用,利用他们的优势,帮助我们提前发现。

在这种思考框架下,我想能不能设立一个“中小企业发展协调促进委员会”,地方政府能不能率先“突围”搞出一些经验来,能不能成立一个跨部门的具有相对较高级别的协调机构,来协调处理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现在科技局有资金、财政局有资金、经信委有资金、发改委有资金,国家很重视中小企业发展,但这些资源优势散落在各个部门,能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统筹推进这项工作?

另外,应该改变过去那种简单的补贴、简单的给钱的方式,能不能由政府主导,提供政策,把它做成一个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假设成立一个规模较大的资金管理公司,让这些资金在一个动态数据库和一套、一系列的制度供应支撑下,按照科学的办法,把这些资金奖励给担保公司、银行、天使投资人等。政府在背后营造环境、提供制度,给他们奖励和补助,这样政府的帮助一定具有很大的放大作用。



汤继强

来论

国企对社会责任应有“长子”风范

■ 王振宇

11月8日,中国社科院发布了2011年《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对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百强的社会责任发展水平进行大排行。结果显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整体水平低下,满分为100分,平均仅为19.7分,2/3的企业没有推动社会责任管理,超过八成的A股上市公司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不及格。令人稍感安慰的是,国有企业综合得分31.7分,远远地高于民企和外企。

当今国内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数据公布后,还是让国人之一惊,国内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状况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与上述数据能够形成相互印证的是,近来已经成为社会热点的苏丹红、“桥塌塌”、“楼裂裂”、云南锡污染、三鹿奶粉等事件都是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表现,提到这些典型,义愤填膺的人们马上就对社会责任缺失一词有了直观的感受。这些反面典型,不少是国企和上市公司。

按经济学原理来说,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原因在于企业缺乏有效制度监管下的功能纯经济化。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微观组织,其任务是将生产要素有效组合成现实生产力,即产品或劳务。从这个意义上说,追求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是企业的天性,也是企业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动力。但是,任何企业既是经济组织,也是社会组织。这就要求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必须妥善处理好盈利功能和社会功能,妥善协调企业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

要想解决国内企业普遍存在的社会责任缺失的问题,除了需要社会多方合力,包括政府部门、消费者、非政府组织和企业的齐心协力,营造承担社会责任的法律、道德等社会氛围外,国有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起的率先示范作用不可忽视。

国有企业是“共和国长子”,这是国人自己也常挂在嘴边的话。既为“长子”,得父母恩惠最早最多,回报大小也有个长幼有序的原则。那么作为长子,就要承担更多的义务,譬如父母的医疗费用、养老保险等等,小弟们才能紧跟上去。假如兄弟们一个比一个抠门,一个比一个小气,谁都不想承担责任和义务,这样的家庭能和谐吗?由此及彼,作为老大哥的国有企业不带头承担社会责任,那么民营企业自然也就不会主动去奉献什么。如此之下,常常作为代表着政府公众形象的国有企业,理所应当、义不容辞、不可推卸地有责任去树立起自己老大哥的形象,拿出事实,给那些民营企业兄弟看看,到时候,这个社会岂不更加温馨、更加宽容、更加和谐了?

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决定了它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主要经济成分,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既是在社会转型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提高企业的生存能力、发展能力与市场竞争力的客观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从某种程度上便是社会保障主义,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在社会保障方面应该做出更大贡献。国企不同于以盈利为首要目的或唯一目的的民营或外资企业,国企不能以盈利为首要目的,而应以满足公共需要为目标,因此,国企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此外,国企比民企占用更多的社会资源,一直以来,国企因垄断、与民争利、奢侈腐败而广为诟病,国企也亟须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将财富归还给社会。国企如果在社会责任上不带头,是没有办法向社会交代的,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从这次公布的“蓝皮书”报告中的数据来看,近年来无论是政府还是国有企业自身,在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对履行社会责任的内涵、方式和方法也予以了明确和规范。在国企百强中不乏中国远洋集团这样连续三年排名第一,在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走在前列的佼佼者。相信国有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不仅继续走在民企和外企的前面,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地发挥率先示范作用和引领作用。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提高一个层次,必将带动国内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进一步大举。

在工作中提升自我

记重庆中宇工程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吴梦军



吴梦军,汉族,中共党员,1973年7月出生,重庆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自1995年7月参加工作以来,历任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隧道工程所土建室主任、重庆中宇工程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2011年5月,被中国交通建设监理协会评为交通建设优秀监理工程师,2011年8月,荣获第一届“中央企业青年五四奖章”荣誉称号。

重庆中宇工程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于1996年,经交通部1996[130]号文批准,由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原交通部重庆公路科学研究所)独资组建成立,具有在全国范围内从事一、二、三类公路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监理业务资格。

吴梦军在思想方面,始终以习近平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自觉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积极开展与参加“创先争优”活动,不断提升自身的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在实际工作中,吴梦军坚持把学业深造与执业资格考试等理论学习和主持科研项目与公司管理工作等实践相结合,通过不断的学习与总结,使自身的专业水平和能力得到了较大的提升。

在从事隧道工程的科研、检测与设计期间,吴梦军主持各类项目17项,主要包括“公路隧道喷射防水层技术研究”、“六车道公路连拱隧道信息化施工技术研究”、“大断面连拱隧道设计施工关键技术研究”等设计咨询项目。所主持项目均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并多次获奖。

吴梦军在工作与学习过程中,能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先锋模范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信念坚定、勇于创新、甘于奉献,通过他踏踏实实的工作,在自己各个岗位上取得了突出的业绩。(陈杰)

时评

APEC 会议与世界经济困局

■ 牛海荣

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即将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拉开帷幕。由于这次会议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美欧债务危机深重的大背景下举行,因此格外引人关注。

人们期待,亚太经合组织能为全球经济走出困局开出一个良方,更希望亚太地区能够在引领世界经济复苏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把脉全球经济困局

本次峰会的召开正值全球经济复苏面临十字路口:发达经济体复苏进程显著放缓,二次探底风险切实存在,如何消除世界经济中的不确定性犹如一道难解的谜题,困扰着经济学家和各国领导人。

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美国的经济复苏如履薄冰。不仅就业、住房市场长期不振,曾一度引领复苏的制造业也动力减弱。消费者信心不稳、高企的赤字水平以及激烈的党派之争

也让政府在制定经济刺激政策时左右为难。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此次复苏进程将长期而艰难。

而在大西洋彼岸,欧洲还在为债务问题焦头烂额。希腊的问题尚未解决,意大利又成为众矢之的。经合组织10月31日发布报告,将欧元区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1.6%,明年经济增长预期从2%大幅下调至0.3%。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表示,世界经济正踏进一个“新的危险区”。他警告说,一些新的风险,包括一些国家出现的政治风险、希腊主权债务重组遭受挫折、银行业流动性不足等都会引发市场信心波动,冲击欧元区和全球经济复苏。

探寻亚太增长方略

经济危机后形成的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双速复苏”的局面仍在继续,全球经济重心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转移,而亚洲地区则以其较快的增长速度继续引领全球经济复苏。

然而,高速增长的亚洲并非身居

危机之外,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亚洲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巨大挑战。

从自身来看,亚洲新兴经济体不但面临着过度投资所造成的经济过热和资产泡沫风险,还面临由美元贬值、大宗商品特别是能源价格上涨以及粮食价格上涨交织在一起造成的输入性通胀问题。

从外部环境来看,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仍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这对许多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出口的亚洲经济体来说无异于悬在头顶的一把利剑,随时有坠落的可能。

因此,为应对挑战,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需要在保持经济增速的同时,更注重经济增长质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扩大内需,并继续强化地区经济一体化目标。相信这也将是各经济体领导人和工商界人士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热议的焦点话题之一。

成员合作任重道远

全球经济复苏需要依赖亚太经济稳定增长,这一点在亚太经合组织

成员中已达成共识。然而,要实现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亚太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亚太经合组织仍任重道远。

首先,成员国间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如何在强调“绿色增长”、“技术创新合作”和“环境产品和服务自由化”等目标的同时考虑到各成员国面临的实际情况,实现区域内环境、贸易和发展的“三赢”,是一个值得各方深思的课题。

其次,亚太经合组织一直致力于减少贸易和投资壁垒,但如今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放缓,各经济体内部经济政策面临诸多困难,如何维护和巩固多边贸易体制、抵御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将再一次考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的智慧。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20多年的风风雨雨,亚太经合组织已形成独特的合作方式以及充分调动政治、经济、学术界广泛参与的互动模式。此外,该组织的运作模式特别注重凝聚共识、分享经验、先易后难,最终达到积跬步以成千里目标。